

日本国家战略视域中的日美同盟

——战略定位、政策手段及效果评估

朱海燕

内容提要 安倍晋三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完善了日本国家战略框架,进一步明确其战略目标即修改宪法、摆脱“战后体制”。在日本的战略规划中,日美同盟被定位为安全与外交的基轴,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公共产品,国际社会发展与繁荣的战略保障。为使日美同盟发挥最大工具性效应,日本在战略规划上谋求与美国战略的对接;政治上,以首脑关系引领同盟发展;外交上,积极打造共同议题,试图主动诱导同盟走向;安全上,最大限度地强化和充实日本多维度跨域联合防卫能力,使日本成为有战略价值、能自主防卫的盟国;经济领域,追随美国,试图引领世界经贸规则的调整和修订。日本对日美同盟的战略利用提升了其国际存在感,扩充了外交转圜空间,防卫能力实现质的提升和飞跃。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政策的收益良多,但并未完全达成其战略初衷:日美在朝鲜核导问题上步伐一度失调,使日本的朝鲜政策陷入困顿;日美贸易争端并未因同盟关系的特殊性而缓解;特朗普对同盟价值的质疑将在同盟关系的未来发展中

* 朱海燕: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邮编:710061)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日本安倍政府摆脱‘战后体制’战略与中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5BGJ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意见,文中错误及疏漏概由笔者负责。

产生诸多“后遗症”；日本与美国的战略捆绑使日本在安全上进一步疏离邻国，阻碍日本融入地区一体化的进度和深度。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日本 国家战略 外交政策 日美同盟 美国优先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被中国反超，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跌落，导致日本国家整体心态失衡，对抗中国成为日本外交与安全的核心考量。在手段选择上，一方面，日本极力在国际社会制造和贩卖“中国威胁论”，恶化并破坏中国崛起软环境的同时，拉帮结伙施压中国；另一方面，加大了军事安全手段在对华政策中的权重，其中包括从日本国家战略利益出发，战略性调度和利用日美同盟的力量直接遏制中国崛起。日本的相关施策推动日美同盟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即美国从日美同盟完全的“主导国”向协商性“领导国”转变，而日本由“从属国”开始向“辅助国”转变，最突出表现是日本开始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整体谋划，将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加以运用，推动日美同盟由双边型同盟关系向“双边+”模式转变，积极拓展同盟的作用领域和范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主动性逐渐提升，并取得了积极的政策收效，而这也将激励日本进一步向同盟索取更多权益和利益，推动同盟关系转变的同时，将对地区安全和发展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这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变化趋向。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次就任日本首相后，明确提出其国家战略目标是修改日本宪法，最终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以此为目标，日本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推出一系列外交与安保相关政策官方文件。在安倍掌舵下，日本国家战略架构日趋清晰和完善，战略活跃度不断提高。2020年8月，安倍辞去首相职务，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接任首相，菅义伟明确表示将承继安倍时期的既定战略，部分学者甚至将其界定为“幕后安倍时代”，^①菅义伟就任以来的内外施策也充分展露“安倍时代”国家战略的延续，因此，可以将安倍政府与菅义伟政府视为一个在战略上保持连续性的整体进行相关研判。在该时段内，日本一直相对稳定地推进其既定的摆脱“战后体制”战略，并积极有效地利用日美同盟这一重要战

^① 刘江永：《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面临新挑战》，《日本学刊》2020年第5期，第30页。

略工具。菅义伟任首相期间,日本最重要的外交施策方向就是大大拓展和深化日美同盟的合作领域和范畴,将美日澳印四方会谈提升为首脑级合作,甚至谋求合作的制度化发展。2021年10月,岸田文雄接任首相,日本积极释放尽早访美的外交信号,以进一步稳定日美同盟的根基,应对后疫情时代变动不居的地区和国际局势。可以预见,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在绑定美国的同时,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仍将是日本未来重要的政策方向。为使相关施策的收益最大化,日本逐渐将日美同盟内化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日本国家战略追求渐进性嵌入日美同盟的战略目标,^①使以维护美国战略利益为运作目标的日美同盟,逐渐向扩大日美两国共同利益转变,彰显了日本战略能力和战略主动性的提升。

国内外学界对日美同盟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从广义角度可大致分为三类:^②一是对日美同盟历史及其在不同战略背景下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研究和探讨;^③二是关注日美同盟及其对亚太地区、中国的影响;^④第三类是对美日两国在联盟框架下相互关系及其他相关构件的分析和解读。^⑤其中,有关日美同盟相关构件的研究成果部分地涉及日本在联盟关系中的地位及其对联盟战略走向的影响等问题,但尚缺乏深度探讨日本如何利用日美同盟追求国家战略目标及利益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尝试从日本视角出发,利用日本官方相关文件资料,进一步充实和拓展对日美同盟的

① 即日本通过渲染安全威胁,使美国不断放松甚至开始公开支持日本修宪、发展自主防卫能力,并将其明确载入日美同盟联合文件,成为同盟的共同目标和意愿。

② 此为概括性粗线条分类,同时,篇幅所限,本文列举相关文献仅为小部分,挂一漏万,每个年代的仅选取其中一小部分。

③ 金熙德:《日美安全同盟重新定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期;吕耀东:《美日同盟的发展轨迹》,《当代世界》2007年第9期;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美国研究》2015年第4期;尚书:《美日同盟关系走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衣昭杰:《冷战后美日同盟转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Richard L. Armitage, et al., “The U. S. -Japan Alliance in 2020: An Equal Alliance with A Global Agenda,”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201204_Armitage_Nye_US_Japan_Alliance_1.pdf, 2021-09-07。

④ 参见倪峰:《美日同盟与地区安全》,《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徐万胜:《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中国周边安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张仕荣:《21世纪初期中美日安全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⑤ 王屏:《集体自卫权:日美军事同盟的本质性特征》,《亚非纵横》2014年第4期;李阳:《论弱勢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澳〕麦考马克等:《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董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

解析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研判。

一、日本国家战略中的日美同盟定位

日本国家战略中的日美同盟定位是随着日本自身力量及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基本趋势是日本不断增强在国家战略中利用日美同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使日美同盟成为日本重要的战略工具之一,并在与同盟的互动中拓展国际活动空间,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安倍政府作为一届超长期政府,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这成为日本践行以修改宪法(至少为“后安倍时代”完成修宪创造突破口)、摆脱“战后体制”为核心目标的国家战略的政治资本。在日本国家战略谋划中,日美同盟是助力其达成目标的有效路径,因此,安倍承继以往日本政府视日美同盟为安全与外交基轴的基本战略定位的同时,进一步将日美同盟扩展为确保地区和平稳定的公共产品,并将维护世界经济繁荣、确保西方价值观及其主导下构建的“国际秩序”深度植入日美同盟的目标追求中,使其成为“秩序”与“规则”的保障者与供给者,完成了日美同盟的“全球性”拓展,为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行动提供背书。

(一)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相关政策的基轴

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单向军事依赖源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军事占领。占领期间,美国主导设计并实施了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改革,作为改革的标志性成果,日本颁布放弃战争权与武装权的《和平宪法》。1952年,《旧金山对日和约》(以下简称《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国家主权和独立,作为占领军的美军应限期撤出日本,其结果是,没有军队的日本的安全保障便成为切实挑战。为解决日本的安全问题及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在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日美还签订《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即《日美安保条约》),以及规定日美在履行该条约时相互间权利与义务的《日美行政协定》,但该约并没有明确美国保护日本的法律义务。美军由“占领军”变身为“驻日美军”,继续留驻日本,这也是日美同盟的起点。20世纪60年代,岸信介推动修订《日美安保条约》,从法律上明确了驻日美军对日本安全的防卫义务,日美同盟更是被逐渐打造为日本外交与安全的基轴,由此也养成了日本外交中的“占领根性”,使日本“失去了开展外交所应该具有的外交感觉,而把如何开展与占

领军当局的从属关系或服从关系、如何成为占领军听话的孩子当成了外交,而且容易普遍化。……尽管恢复了独立地位,但不可能马上恢复外交的感觉”。^①这种对美国在外交与安全上的依赖,最终内化于日本政治领导人的潜意识中,“占领根性”的影响也在“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基轴”理念的渗透下越来越深远和持久,成为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在制定外交与安全相关政策时遵从的主臬。

2012年底再次执政的安倍认为,民主党执政期间在日美同盟问题上的相关政策使日美同盟出现裂痕,^②损害了日本外交与安全的基轴,在国际社会造成日美同盟不稳的认知,加剧了日本周边安全形势的动荡,可能给日本的安全环境造成消极影响。为确保安全,解决日本面临的“危机”,安倍政府外交日程表上“最重要的是必须重建日美同盟的信赖关系”,而“再次加强日本外交的基础——日美同盟的纽带,是重建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第一步”。^③为此,安倍积极协调尽早访美,与美国总统举行会晤,以重新巩固日本外交与安全的基础。2013年初,安倍再次指出:“日本外交和日本安保政策的基轴是日美同盟。我认为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基轴,这应在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中最为优先。”^④安倍在2013年2月访美前明确强调:“希望通过这次会谈向亚洲各国展示日美同盟已经恢复了紧密的关系,这有利于保卫日本的领海、领土,一定要使会谈取得成功。”^⑤访美后,安倍称“日美同盟完全恢复”了。其后,安倍在其连续执政7年零8个月期间,共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举行包括电话会谈在内的双边会谈(不包括多边会谈)共66次,^⑥这既体现了日本对日美同盟作为“基轴”的重视,更强化了日美同盟的政治基础,为日美同盟的继续发展

① [日]孙崎亨:《日美同盟真相》,郭一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81—82页。

② 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出任首相期间,大幅调整日本外交政策,提出打造日美对等关系,构建排除美国的“东亚共同体”,在中美日间形成等边三角形的关系架构,同时停止履行普天间基地搬迁协议,虽然其后菅直人、野田佳彦均极力修复日美同盟,但因日本首相频繁更迭,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受损害的日美间信任的重建进程。

③ 「平成24年12月26日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就任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2/1226kaiken.html, 2020-11-01。

④ 「平成25年1月4日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年頭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104kaiken.html, 2020-11-23。

⑤ 《安倍今起访美将晤奥巴马 中日关系或成重要议题》,http://news.12371.cn/2013/02/21/AR-TI1361409482379439.shtml, 2021-04-25。

⑥ 该数据系根据日本外务省网站统计。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usa/visit/index.html.shtml, 2021-04-25。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更重要的是向其他国家表明日美同盟将继续为日本提供包括核威慑在内的安全保障,从而在日本尚未明确修改宪法前确保日本的安全。

菅义伟的施政方略是在微调基础上基本延续其前任政府的既定政策路线。组阁当日,菅义伟即表示将“继续贯彻安倍内阁的方针,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开展战略性外交”。^① 2020年9月,菅义伟在与特朗普的首次电话会谈中称,“基于安倍前首相和特朗普总统之间的深厚互信,日美同盟得到空前巩固,我希望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② 10月初,蓬佩奥访日期间分别与菅义伟及外相茂木敏充举行双边会谈,确认菅政府将继续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与安全的基轴。10月7日,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与美国防部长埃斯珀电话会谈中,确认将继续强化同盟关系。至此,菅政府主要对外机构均实现了与美国的政策对接,完成了日本外交与安全基础的再确认。

菅义伟在2021年的新年致辞再次强调了日美同盟的基础性地位。面对疫情的恶化、病毒变异体造成的新恐慌、美国社会的继续分裂,菅义伟表示,“在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不确定的背景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将保持稳定。以日美同盟为基石,日本将战略性推进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并与邻国构建稳定的关系”。同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更需要团结应对,日本将“坚持多边主义,领导在后疫情时代建立‘团结的世界’”。^③这透露出对美国国内可能再次出现的单边主义思潮的牵制,在疫情背景下显示出日本主动性的增强。菅义伟在2021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再次首先强调了多边主义原则,其次突出“日美同盟是我国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础”。^④ 4月,日美首脑会谈(以下简称“拜管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同样重申了日美同盟的“基石”角色,需要注意的是:该联合声明指称,日美同盟不仅是日本国家的“基石”,美国也将其称为“基石”,这既是拜登政府重视同盟的表现,也体现了日本在同盟框架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相应地日本也将承担更多同盟义务,其后续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① 「令和2年9月16日 菅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 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0/0916kaiken.html, 2020-12-15。

② 「令和2年9月20日 日米首脳電話会談」,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6_000432.html, 2020-12-05。

③ 「菅内閣総理大臣 令和3年年頭所感」, 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1/0101nentou.html, 2021-01-03。

④ 「第二百四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1/0118shoshinhyomei.html, 2021-04-23。

(二) 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公共产品

日美同盟是美国主导,日本积极配合下构建的冷战同盟,也是依据地区及国际安全形势变化,不断就战略目标、政策工具、作用半径等进行调整的应对型同盟。在新的变局中,日本正极力推动将日美同盟打造成为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公共产品。

冷战后,日美同盟失去苏联这一重要战略对手后,一度陷入“漂流”状态。为拉紧同盟纽带,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建议全面审议美国的同盟关系。1995年2月,奈主持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洲仍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紧张和聚集了大量军事力量的地区,维护亚洲的同盟体系是保持地区稳定和促进美国对亚洲关键问题的影响的基础,这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鉴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分量,它在美国构筑适合于后冷战时代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工作中是一个天然伙伴。”“再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美日关系对于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政策和全球的战略目标都是一个基础。我们与日本的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政策的关键”。^①基于此,美国决定按照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动重新定位日美同盟的性质及其功能,使其由抵制和对抗共产主义的双边冷战同盟,转变为在21世纪“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态应对型地区同盟。1996年4月发表的《日美联合安全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指出,“以《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既是保证实现共同安全目标的基石,也将继续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维护安定和繁荣的基础”。^②据此定位,1997年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界定了同盟的适用范围及合作类型,即日美平时的合作、在日本遭到军事进攻时的合作和在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态时的合作。据此,同盟的作用半径大大拓展,打破了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创造了“周边事态”的新战略概念,将日本防卫力量的作用范围扩至“日本周边”。

日美同盟应对“周边事态”的全新定位被其后包括安倍政府在内的历届日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United States Securit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https://nautilus.org/global-problem-solving/us-security-strategy-for-the-east-asia-pacific-region/?view=pdf>, 2020-12-12.

^② “Japan-U. S.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ecurity.html>, 2021-04-24.

本政府承继并加以拓展,使其作用半径扩至“印太”。2014年,日美《联合声明》确认同盟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性功能,“日美同盟,是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①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安倍历次施政演说、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皮书等均明确指出,“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对我国的和平与安全,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②菅义伟在第203届国会上的演说中再次确认:“日美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繁荣、自由的基石。”^③2020年11月,菅义伟向拜登致胜选贺电时强调“日美同盟对于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合作推动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④2021年4月,“拜菅会”后的联合声明中确认日美同盟对“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两国“重申致力于在印太地区实现繁荣和维持经济秩序”,同时还将其作用范畴拓展至“世界范围”。^⑤

日美同盟的作用半径由守卫日本安全,扩展至维护地区安定,经济繁荣也被纳入日美同盟运作的目标,既扩充了军事同盟的内涵,也拓宽了同盟运行的基础,同时还意味着即便在没有“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只要结盟双方认为符合其利益,也将会为确保“繁荣”而继续强化相互间的军事安全纽带。在经济问题日趋安全化的背景下,日美同盟的经济化发展趋向也是值得深度探讨的同盟生长点。

(三) 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在全球治理中获得和扩大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工具

日本致力于将日美同盟打造为全球范围内的“规则”与“秩序”的供给者,使日美同盟成为保障型与供给型同盟,并以此为跳板,逐渐探索确立日本在国际“规则”解释和书写中的引领作用。日美将确保经济繁荣导入同盟目标,使同盟具有“全球性”特征,日本也试图借此追求在全球规则中的影响力。因日

① 「日米共同声明:アジア太平洋及びこれを越えた地域の未来を形作る日本と米国」, http://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0756.html, 2020-12-23。

②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 <https://www.cas.go.jp/jp/siryoku/131217anzenhoshou/nss-j.pdf>, 2021-03-12。

③ 「第二百三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 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0/1026shoshinhyomei.html, 2021-01-03。

④ 「菅総理大臣とバイデン次期米国大統領との電話会談」,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2922.html, 2021-01-03。

⑤ “U. S. -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 S.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7718.pdf>, 2021-04-24。

本防卫力量的建设水平及其运用受到宪法束缚,日美同盟应用地理范畴和物理领域也受到相应限制,虽然日本通过系列临时立法、修改安保法案、修正宪法解释等变通性手段不断扩大防卫力量的地理活动半径及作用领域,也一直尝试渐进性突破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武器使用的约束,但受国民心理惯性等因素制约,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活动中仍然保持着较为谨慎的姿态,其军事安全活动范围具有较为严格的物理局限和作用场域限制。因此,日本难以依靠军事手段达成全球性“政治大国”的战略追求。但当日美两国将确保经济繁荣纳入同盟建设目标时,日美同盟便具备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日本经济力量影响的辐射范围也将随之扩展至全球,这将提升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后疫情时代,随着相关国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安全化政策的不断加码,日本也将可能借此达成其追求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夙愿。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指出,日美同盟“对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美两国……根据规则,在高度透明的前提下实现亚太地区经济繁荣。”^①在这一战略指导下,日本积极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谈判,并在美国退出后又主导《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协议的达成与生效,其目的就是实现“日本与美国作为经济大国,始终强有力地共同引领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使自由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发展。日本将引领其规则的制定”,^②确保掌握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使其有利于自身经济模式的进一步成长和扩展。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本试图继续借助日美同盟谋求在新经济规则中的主导地位。新冠疫情引发的新型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新一轮重构,后疫情时代将是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兴起的机遇。为此,日美强调两国将构建面向 21 世纪新时代的新型合作关系,打造具备核心“竞争力和恢复力的伙伴关系”[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以“确保引领可持续、包容、健康、绿色的全球经济复苏”。为达成该项战略预设目标,两国将侧重于加强在(1)竞争力和创新;(2)新型冠状病毒

①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

② 「第 73 回国連総会出席等についての内外記者会見」, 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8/0926kaiken.html, 2021-03-12。

肺炎(COVID-19)应对及全球卫生和健康安全;以及(3)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绿色经济增长与复苏等领域的伙伴关系建设与合作。为掌握在未来新型经济形态生成及其规则确立过程中的主导权,日美将通过深化合作“单独和共同提高两国的竞争力”,并“构建全球数字连接伙伴关系,与其他国家合作,促进投资,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以促进充满活力的数字经济”。^①

此外,日本还赋予日美同盟以维护日本政治经济模式赖以存在、巩固和发展的西方价值观的功能,以打造日美同盟的“全球性”价值。无论日本在实质上将所谓“民主”“尊重人权”“以法治为基础”等西式价值观置于何种位置,但在表面上,日本一直视这些口号为其在国际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遵循,并且以高频词出现在日本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演讲及政府相关文件中。在实践中,日本也一直祭出“价值观”旗帜,体现其在国际社会的站位,并以此统筹其对外交对象国的政策制定及实施。2006—2007年,安倍第一次出任内阁总理之际,即抛出“自由繁荣之弧”,以所谓共同的价值观为纽带,积极筹谋构建针对异己国家的对抗性价值观联盟。2012年底,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价值观”仍是其在国际舞台站位的基本考量之一,制造出所谓“民主安全菱形联盟”。

为一再向国际社会确认日本是符合西式价值观的国家,日本坚定地绑定日美同盟,并将日美同盟打造为世界范围内维护民主、自由、法治的公共产品,是西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固护甲。日本一再强调“在坚如磐石的日美同盟基础上,两国共同推动与共享基本价值观国家间协作的同时,为维护本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加强进一步合作达成了一致,并再次向世界呼吁我们两国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法治’的重要性”。^②面对“非传统型总统”的特朗普,日本仍尽力推销其所谓“共享价值观”的重要性,将其与特朗普热衷的“印太”战略进行链接:“日美同盟无比牢固,前所未有。在深厚的信赖关系基础上”,“与欧洲、印度、澳洲、东盟等共享基本价值的国家,共同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③拜登就职后,菅义伟通过社交账号表示:“日美是共享普遍价值观、以

① “U. S. -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 S.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② 「平成27年11月22日内外記者会見」、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1122naigai.html、2020-12-12。

③ 「第二百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20/0120shiseihoushin.html、2020-11-28。

强大纽带结成的盟国。期待能与拜登总统开展合作。”^①2021年4月,“拜普会”后的联合声明中更突出了日美同盟与西式民主价值观及该价值观指导下取得的相应成就之间的密切关系,声明称“我们两国虽隔着广阔的海洋,但对普遍价值观和共同原则的承诺,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国际法、多边主义和自由公正的经济秩序,使我们团结起来。……通过美日友好的新时代,我们每个民主国家都将更加强大。”^②

二、日本利用日美同盟的政策手段

在渐进性推动摆脱“战后体制”战略相关施策落地过程中,日本积极利用日美同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体而言,日本在战略层面对同盟进行绑定、政治层面与同盟运作保持协调、军事层面以能力及体制建设来追随同盟的行动、外交层面与同盟保持对话协调,并打造新的话语体系诱导同盟战略走向。同时,日本还积极拓宽同盟运行平台,将经济领域内的合作打造为日美同盟新的战略域,试图掌控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

第一,在战略层面,日本与美国及日美同盟进行战略捆绑,并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政策路径使其助力于日本国家战略的实现。日本积极与美国就日美同盟的发展方向、威胁来源、安全态势等进行战略沟通。在政府首脑层面,日本首相积极构建并极力保持与美国总统间的密切往来关系,并就紧急事态随时进行电话沟通,极力将日本的战略设想嵌入日美同盟的战略运作,同时又主动设计,诱导日美同盟与日本国家战略处于同向战略轨道。在政策技术层面,日本推动日美“2+2”对话机制高效、有针对性地运转,推动达成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外相与美国国务卿,防相与美国国防部长共同或单独会晤的频率保持在每年3、4次,双方还借助其他国际会议多边场合、“2+2”等小多边会晤之际举行会谈,就日美同盟的存在意义及承诺、外交及安全政策的协调与对接、同盟角色、能力建设、同盟安保合作范畴及深度的界定、驻日美军基地部署、财政支持等问题进行协调,确保不断充实同盟运作的实质性内容不跑偏、不脱钩。稳定畅通的战略沟通“使日美在战略层面达成共识,确保安全防

① 《详讯:菅义伟对拜登就任总统表示祝贺》,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1/662931a46c7b.html>, 2021-01-21。

② “U. S. -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 S. -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卫领域的合作基调和政策方向,缓解盟友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持续稳定地传递出同盟紧密合作的信号,发挥同盟机制稳定器的作用”。^①

第二,在政治层面,日本将首脑个人关系打造成同盟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和继续深化、拓展的牵引器,确保同盟的政治协调不脱轨。

在对外关系中,安倍极为重视和强调首脑外交的作用。他认为,不同政府的首脑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有利于构建更为和谐、稳定的国家间关系,同时也可更好沟通和协调国家间的不同见解,“无论存在怎样的问题,只要首脑之间坦诚对话,就定能找到解决良策”。^②同时,安倍认为,积极活跃的首脑外交能够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增强日本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斡旋能力和影响力。安倍在七年多的任职期内,“共出访了80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800多次会谈。在与各国首脑建立互信关系的基础上,我决心为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全球发挥主导性的作用。”^③安倍将他对首脑外交的认知和定位也运用到确保日美同盟的政治协调中,为同盟正常运转及进一步深化提供政治保障。在安倍的首脑会谈记录中,日美首脑直接会晤(双边、多边)、电话交流占居较大份额,这也成为日美保持密切沟通的重要象征。2012年12月就任后,安倍即与奥巴马举行电话会晤,传递早日访美的政治意愿。奥巴马任总统期间,虽因安倍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美国不满,但安倍在推进首脑外交方面抱有执着的信念,最终还是较为成功地建立了与奥巴马之间相对密切的个人关系。2014年4月,安倍坚持邀请奥巴马访日,使其成为18年来首次以国宾身份访日的美国总统,并在奥巴马抵日当晚与其举行寿司私人宴,拉近个人关系。为回报安倍的热情,次年4月,安倍访美期间,奥巴马特意在官方行程之外安排二人在林肯纪念堂外散步,彰显日美关系的密切及两国首脑间个人关系的融洽。

特朗普接任美国总统后,安倍投其所好,竭力构建与特朗普间的“安—特”个人关系。特朗普尚在候任期,安倍即绕道美国会见特朗普,成为特朗普当选后会晤的首个外国领导人;特朗普就任后,日本积极协调,使安倍成为特朗普在白宫接待的第二个外国领导人;为迎合特朗普的爱好,安倍积极练习高尔夫

① 包霞琴、崔樱子:《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第28页。

② 「平成26年11月11日内外記者会見」, 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1111naigai.html, 2020-12-24。

③ 「第二百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球,多次上演“高尔夫外交”,构建官方之外的“安—特”关系;针对特朗普热衷“第一”的心理,日本安排特朗普成为新天皇就职后第一个访问日本且与新天皇举行会晤的国宾,特朗普也成为第一位登临日本舰艇、第一位观看日本相扑比赛的美国总统,这一行程安排“清晰地显示出取悦于特朗普以及重点凸显两国领导人间的亲密关系”,^①为安倍所称的“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历史中,两国之间没有其他首脑像我们这样结下如此深厚友情的,这一点我相当自负”^②言论背书,安倍与特朗普间甚至创造了在2017年9月3日一天内两次举行电话会谈的记录。

在安倍积极谋略及大力推动下,奥巴马时代的日美同盟关系被界定为“无可替代的伙伴关系”。^③特朗普时期,以“安—特”个人关系为基础,日美同盟发展成“无比坚固,前所未有”的同盟,^④为日本从国家战略出发诱导同盟战略方向定位提供了政治可能性。

第三,在外交上,日本积极塑造话题,诱导并追随美国,通过与美国同频外交行动彰显日美同盟的利益契合性,助力日本国家战略目标的达成。

对日本而言,“中国威胁论”是其摆脱“战后体制”的极佳借口,也是博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遏制中国崛起的较为有效的手段。“中国威胁论”源自日本历史上形成的“亚洲优等生”意识,这种民族潜意识使日本难以理性看待中国崛起。明治维新的成功激起了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首先腾飞,再次点燃日本作为亚洲“优等生”的心理,这无形中造就了日本的“荣誉偏执和身份迷思”,^⑤并在其指引下走上视崛起的中国为对手和威胁的迷途。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初步成就,特别是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越日本后,日本更是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与威胁,2021年4月发布的新版《外交蓝皮书》将“中国威胁”升级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全

① Anthony Kuhn, “In Trump’s Japan Visit, Golf, Sumo Wrestling—And A Raft of Policy Differences,” <https://www.npr.org/2019/05/27/727280758/in-trumps-japan-visit-golf-sumo-wrestling-and-a-raft-of-policy-differences>, 2020-11-02.

② 「内外情勢調査会全国懇談会安倍総理講演」、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7/1219naigai.html, 2020-11-02.

③ 「日米共同声明:アジア太平洋及びこれを越えた地域の未来を形作る日本と米国」。

④ 「第二百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⑤ 陆伟:《荣誉偏执、身份迷思与日本战略偏好的转向》,《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16页。

保障上的强烈关切(事项)”,^①并将其成功传导给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美国均以中国为潜在对手,至特朗普政府已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拜登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对中国的战略定位。2021年4月,“拜菅会”后的联合声明称,双方“就中国的行动对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影响交换了意见,并对中国采取经济和其他形式的胁迫等不符合国际秩序规则的活动表示关切”。^②日本成功将其制造的“中国威胁”,置换成日美同盟共同的“中国威胁”,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崛起的战略压力。在实践中,日本将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正常行动,污化为中国以实力打破现状、无视并破坏国际法、军事发展不透明、不遵守国际规则等,并在国际社会大肆販售,成功诱导美国做出钓鱼岛群岛在日美安保体制的安全保障范畴之内的承诺,将中日间的领土争端置换成为美国保护日本领土安全的同盟承诺,顺利制造了中美间又一起矛盾争端引爆点,形成日美联合针对中国的压力态势。

朝鲜问题是日本借以营造安全威胁,摆脱“战后体制”的绝佳借口。日朝关系中较为突出的症结是和平条约、人质绑架、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等问题,其中,安倍政府更为重视的是人质绑架及核导问题。而美朝关系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担负针对韩日的安全承诺问题、朝鲜核导给地区乃至国际社会造成的恐惧心理,以及朝鲜远程导弹可能给美国造成的实际安全威胁。可见,日美在与朝鲜关系中的共同利害交集在于朝鲜核导问题。但日本在多边及双边场合积极游说美国,将绑架问题置换为人权问题,在特朗普访日期间安排其会见被绑架者家属,对其进行“道德绑架”,使特朗普承诺协助解决绑架问题。在朝鲜核导问题上,安倍更是通过电话会谈、多双边场合等所有可能的途径,诱导特朗普允诺将“百分之百支持日本这个伟大的同盟国”。^③在朝核问题上拜登政府继续承诺支持日本的安全关切,“重申对朝鲜完全无核化的承诺,……加强威慑力量,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将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解决与朝鲜核和导弹计划有关的危险,包括扩散的风险”,同时,“重申美国致力于立即解决绑架问题”。^④

① 「令和3年版外交青書」、49頁、<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81433.pdf>、2021-04-28。

② “U. S. -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 S.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③ Joohee Cho and Dean Schabner, “North Korea launches Ballistic Missile Test,”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north-korea-launches-ballistic-missile-test/story?id=45430615>, 2020-10-02.

④ “U. S. -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 S.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的“印太战略”问题上,日本更是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牵引角色。2006年,安倍组阁之际即制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声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为自由与繁荣之海带来富有活力的结合。一个打破原来地理疆界的‘扩大的亚洲’正在日趋明显”。^①2012年,安倍又抛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倡议,强调“两洋交汇”的重要性,提议由日美澳印组成菱形圈,“以保卫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公海”。^②经过酝酿、调整,2016年8月,安倍在第六届日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推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并在国际多双边场合大力推销,尤其注重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呼应。特朗普就职后,以日本极力鼓动的“印太战略”取代“亚太再平衡”,并以“印太”来界定《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8美国国防战略》等文件中的战略区域,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使“印太战略”进入实质性落实阶段。至此,日本基本完成对“印太”这一范畴从概念煽动、政策鼓吹到向美国进行战略贩卖的全过程,成功使“印太”成为日美同盟协力应对的战略空间。在日美同盟的支撑下,“印太”也博得了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这就为日本进一步拓展自卫队的活动空间赢得了更为广泛政治支持。

第四,在安全层面,日本借强化同盟之名,行提升防卫力量之实,谋求独立安保能力建设的同时,使日本成为有价值的盟国,进而提升日本在同盟框架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强摆脱“战后体制”的实力。

日本通过直接购买美国先进武器装备,提升自卫队装备水平,同时还积极推动与美国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加强与美军装备互操作性的同时,提高日本防卫技术研发层级。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日美间“除推进联合训练、联合情报收集、警戒监视和侦察活动、美军和自卫队共用设施与区域外,包括应对事态、中长期战略等在内,还将紧密开展各种部队合作,并协调政策”,“将在弹道导弹防卫、海洋、太空空间、网络空间和大规模灾害应对等安全保障领域广泛加强合作,提升日美同盟的遏制力和应对力。”^③为进一步提高与美国的防卫装备合作水平,2014年4月,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

① Shinzo Abe,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2020-12-04.

②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2020-11-04>.

③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

“武器出口三原则”,据此,日本可与美国等关系密切国家共同开发和生产武器装备。为推进装备采购合作,2016年,日美签署《国防互惠采购谅解备忘录》(Reciprocal Defense Procurement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这将深化两国的防务关系,并有助于日本企业成为美国重大国防项目的供应商,促进伙伴国间装备的合理化、标准化及互操作性。^① 据此,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GA-ASI)将与日本国防工业供应商和相关企业就远程驾驶飞机(RPA)系统的研发工作进行合作。在联合研发方面,涉及领域包括导弹防御、雷达、高速船舶等,未来两国还将在太空防御、海洋安全、网络领域等方面提升联合研发水平,掌控和引领新的战略空域内的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2020年4月,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建议,未来日美需要在无人系统、高超音速/超高速导弹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及合作,此类合作既符合美国的战略目标,又符合日本地区利益,将是“双赢”的选择。^②

日本积极参与与美国的双边及美国主导的多边军事演习、训练,提升与美军之间的协同行动能力、一体化水平和联合应对实力,增强自卫队的实战水平及应对各种事态的能力。近年,日美同盟的军事演习、联合训练呈频率提高、参演人员数量增加、军事装备级别提升、针对性加强、由双边扩大至双多边、演练区域不断扩大、演练项目针对性强等发展趋势。2020年,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日美在西太平洋举行了年度最大规模军演“利剑21”。在兵力规模上,美军出动了“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第5舰载机联队、海军第72特遣队和空军第5航空队,共计约9000人。日本自卫队参演兵力3.7万人,舰艇20艘,飞机170架,美日两国参演总兵力达4.6万人。演习重点是检验美日两国作战力量在海上、地面与空中的协同作战能力,“确保一旦印太地区发生危机或紧急事件,美军能够有效支援日本的防卫作战”。^③ 在日美双边联合军演之外,还发展出日美澳、日美澳印、日美法、日美英等多边演练,日本还高频率参加美国主导的与其他亚太盟友间的军演,如美菲、美泰、美印等双边年度联合军演中都出现过自卫队的影子。这些不间断、各领域的联合军演使得在战

① 余静:《日本、美国签署国防采购协议》, <http://www.dsti.net/Information/News/100004>, 2020-11-04。

② Tate Nurkin and Ryo Hinata-Yamaguchi,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US-Japan Defense Collaboratio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Emerging-Technologies-and-the-Future-of-US-Japan-Defense-Collaboration.pdf>, 2021-02-06。

③ 蓝鹰:《美日年度最大规模军演释放什么信号》,《中国青年报》2020年11月5日,第8版。

后没有实战经验的自卫队能够获得相应的类实战认知和能力养成,从而形成一定的威慑力。

依靠美国帮助,日本加快在被称为新战略域的太空及网络领域的军事化脚步,提升和拓展日本在新域的防卫能力。在太空安全领域,2013年3月,日美举行首届全面太空对话会议,正式开启双方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议程。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明确双方将强化在太空监视、情报共享、装备技术、早期预警、定位导航、指挥控制、利用卫星加强海洋监控、监视威胁太空开发的太空垃圾等方面的合作。为切实开展在新战略域的合作,日美成立太空合作工作小组(SCWG),就太空政策对话、情报共享、培养和保护专家、实施桌面推演、跨部门合作、官民协调等进行磋商。为抢占太空高地,2018年起,美国即向日本提供技术支持,协助自卫队建立太空态势感知系统,提升自卫队的太空监视能力。2019年,美日就双方的太空态势感知系统进行技术链接达成共识。此外,美日还就构建太空飞行和探测国际规则方面进行合作,谋求以日美为中心,在相关国家之间共享的“太空管制系统”,借此完善太空国际交通规则。^① 2020年8月,日美第7次太空对话再次强调在太空探索与开发领域进行合作的必要性,“承诺加强太空态势感知(SSA)和任务保障方面的合作,双方欢迎日本内阁和美国国防部实质性批准了有关将在2024年3月底前发射的日本‘准天顶’卫星上搭载美国提供的SSA有效载荷的具体实施安排”。^②

在网络领域,日本通过与美国的合作提升网战实力。日美在网络领域的合作起始于经济范畴,2010年11月,日美在东京举行首次互联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会,并发展为年度例行对话机制。随着网络安全被提升至战略高度,美日网络合作由经济、商业及个人安全向国家安全过渡。2013年5月,第一届“日美网络对话”在东京举行(其后发展成为年度会晤机制),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清晰界定了美日网络合作的机制及内容范畴:双方交换网络威胁信息,协调国际网络政策,比较国家网络战略,协调网络领域的国防和安全政策,就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规划进行合作。^③ 10月,美日签署加强网络空间军事协

① 《日美将合作建立太空交通管制系统》,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9/11/c_1210275813.htm, 2020-12-26。

② 「『宇宙に関する包括的日米対話』第7回会合の開催(結果)」,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8704.html, 2021-01-08。

③ 张景全、程鹏翔:《美日同盟新空域:网络及太空合作》,《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1期,第87页。

作的协议,据此,日美将在情报收集、信息安全、监控侦查、设备使用、扩展威慑、人员培训和军事演习等领域进行密切合作。2015年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把网络列为新的战略合作领域,提出打造应对网络威胁的现代化同盟关系。2019年10月,日美在第7次网络对话中再次确认举日美两国“全政府”之力进行合作,同时重申将强化共享价值观的同盟伙伴关系,两国将就网络相关事务,包括态势感知、网络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国内网络政策、两国网络军事力量合作,并在国际法及能力建设等领域强化合作。2021年“拜营会”后的联合声明强调两国“将在敏感的供应链上,包括在半导体方面的合作,促进和保护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①

第五,在经济领域,日本积极拓展日美合作范畴,借助同盟之力,扩大日本在经济规则领域的话语权。

奥巴马时代,美国公开提出要掌握经济规则的制定权,日本积极响应,声称“日本与美国这两个经济大国参与制定的新经济秩序,不仅仅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中的规则。对于在这之后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更大的构想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也应当成为制定规则的原案”。^② 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安倍先是积极游说,劝说并期待其重返协议,后又推动没有美国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生效,试图以此施压特朗普,同时在国际场合也反复强调日本将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在诱导美国遵循自由贸易规则的同时,也表明日本不同于美国的立场。在特朗普坚定拒绝多边贸易协定后,日本转而与美国达成新的《日美贸易协定》,以暂时躲避美国的关税大棒,日本将其界定为“双赢的成果”,并宣称在《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及《日美贸易协定》生效后,“出现了以我国为枢纽、占全球经济六成的巨大自由经济圈”,这赋予了“日本今后将继续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引领全球规则的制定,并决心向全球推广基于自由、开放、公正规则建立起来的经济圈”的能力。^③

① “U. S. -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 S.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② 「平成25年3月15日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315kaiken.html、2020-12-16。

③ 「第74回国連総会出席等についての内外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925kaiken.html、2021-06-16。

根据拜登政府与菅政府的互动态势,可以预知,日本在未来将通过与美国继续强化并拓宽在新冠疫情应对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气候变化、数字经济、尖端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等领域的合作,这将提升日本对未来经济社会及相应规则的预判和掌控能力,进而提升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为日本外交与安全的基轴,日美同盟逐渐成为日本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地位与能力不断提升,使其不再仅限于搭乘安保“顺风车”或缴纳同盟运行保障经费的“从属国”,而是逐渐发展成为可以诱导同盟发展方向的“辅助国”,作为同盟完全“主导国”的美国则渐趋向协商性“领导国”转变。日本“用最小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成果”,^①以首脑外交彰显日美同盟关系的紧密,至少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日本对美影响力提升的印象。同时,以强化同盟威慑力为噱头,积极推动日本防卫能力提升及防卫体制改革,使日本自卫队成为有能力、有权利参加或发动战争的武装机器,这对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目标设定而言,是其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最大收益。

三、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效果评估

日本在追求国家战略利益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积极利用日美同盟这一重要战略工具,取得一定收效,最明显的就是美国逐渐转向支持日本防卫能力建设和防卫体制调整,甚至鼓励其承担更多防卫义务,这正是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之一。但日本在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过程中,也并非是完全的赢家,绑定美国的策略加大了日本与“亚洲”间的裂度,加深了亚洲安全的碎片化程度,给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注入负能量。同时,日本以深化与美国同盟关系的政策选择来推动“战略自主”进程,长远来看可能损害日本构建“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追求。

(一) 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政策收益

第一,政治增益。日本打造的“安—特”关系,提升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本首相甚至成为其他国家首脑与特朗普间的政治“掮客”。“无论是在联合国总会,还是在 G20 峰会等国际会议的会场上,亚洲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

^① [日]近藤大介:《超长续航的安倍政权》,《经济观察报》2019年12月2日,第35版。

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纷纷申请与日本召开首脑会谈,并希望安倍代为向特朗普转达讯息。”^①日本也得以与提出“转达讯息”请求的国家间进行外交交易。在国内政治层面,构建并维系良好的日美关系是日本首相维系长期政权的重要外部支撑。战后日本“长命”政权的掌舵人,都与美国总统建立起良好的公私关系,得到美国的肯定与支持。因此,从追求长期执政,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和稳定的政治局面来推进既定国家战略的角度而言,相对稳定良好的日美关系使安倍成为日本内阁制史上的赢家。菅义伟接任首相后,特朗普同样表达了可以“随时沟通”的善意。拜登就任后,菅义伟成为拜登在白宫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日本也是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外访的首选地。2021年9月,菅义伟提出将辞去首相职务,不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后,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日美同盟将继续像“钢铁”一样坚固。岸田出任日本首相后,拜登也第一时间向其表示祝贺,并期待“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强化两国间历史性的同盟资产,以共同应对时代挑战”。^②美国的系列表态及政策行为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美国重视日本的明确且强烈的政治信号。

第二,外交空间扩容,日本以日美同盟为核心链接点及后盾,搭建起以其自身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次级准同盟体系。

日本制造和渲染地区矛盾争端,以此聚拢和拉紧伙伴国。如前所述,朝鲜问题和“中国威胁论”是日本在国际社会惯用的博得同情和支持的外交借口。这种外交伎俩一方面牵引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使美国更加重视日本在其“亚—印—太”战略中的价值,从而达成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诱使美国进一步支持日本提升防卫能力建设、改革防卫体制相关法律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为节约战略支出,美国充分调动亚太同盟体系的战略潜力,推动和鼓励其亚太盟友之间构建起双边或多边安全防务关系,推动“辐辏型”同盟体系向“网格状”同盟结构转变,这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同盟主导国美国的权力密度,使立体式的同盟格局逐渐扁平化,为同盟体系内非主导国影响力的上升制造了操作空间。日本及时抓住美国这一战略动向,积极主动地加以利用,

① [日]近藤大介:《超长续航的安倍政权》。

②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iden Congratulating Prime Minister Kishida of Japa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04/statement-by-president-biden-congratulating-prime-minister-kishida-of-japan/>, 2021-10-18.

并推动其进一步升级,构建起日本处于核心地位的安全关系网络,^①尤其是以日美同盟为核心链接点,合纵连横组建起的“日美+”模式逐渐成为地区秩序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变量。特朗普出任总统后,其政策的不明朗性、不确定性及其以短期内即可收效的实际利益为导向的外交姿态,使亚太地区的秩序调整速度和深度都呈加速发展态势,加大了地区局势的震荡频度与幅度,更放大了美国亚太盟友的不安情绪。这种背景下,日本加大在亚太地区的政策操作力度,经营东南亚、打通印度洋、走向非洲角,以及在日印、日澳、日美澳印、日欧(欧盟、北约、英法德等欧洲大国)、日本东盟、日非等安全合作方面,都以坚定的战略盘算谋求担负亚洲的领导角色。^②拜登政府更加重视调动其同盟体系的活跃度和应对力。就任不久,拜登即牵头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为首脑级别,并主持第一次首脑峰会,同时还探讨将韩国纳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可能性。此后,美国高官亲赴日本,举行“2+2”会谈,期间再次试探推动重启日美韩安全合作,日本予以积极回应。依托日美同盟进行的系列外交活动极大拓展了日本的外交空间,提升了外交折冲能力,日本德国启动“2+2”会谈机制即是明证,这些都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营造了相对正面的外交环境。

第三,安全保障能力大增:日本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幌子,在防卫能力建设与安保体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战略的核心就是推动安保领域的突进和质变,而日本防卫力量调整及体制的变革需要美国默许、支持。武器装备是防卫能力的核心构件,美国为支持日本防卫力建设,允许日本大批购进美国先进装备,支持日本发展进攻性能力和手段,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更是加大了向日本的售武力度,尤其注重提升日本航天、航空及海上防卫的装备水平。2018年1月,日本空自开始部署美制第五代隐形战机F-35A,并与美驻日基地的F-35进行联演,提升互操作能力和联合威慑力。2018年底,为提升日本空自的战力,日本加购F-35战机至147架(包括之前计划采购的42架F-35A及追加的63架F-35A以及42架F-35B垂直/短距起降型),日本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F-35战机第二大用户。为提高情报、监视和侦察(ISR)能力,日本同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达成购买E-2D先进鹰眼机载预警机及RQ-4“全球鹰”

① 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

② 张瑞婷、吴怀中:《论日本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利用》,《日本研究》2015年第4期,第22页。

无人机(UAS)的合同。E-2D 鹰眼是一种全天候的舰载战术预警机,具有全新的雷达、战区导弹防御能力、多传感器集成和战术的玻璃座舱的特点。RQ-4 全球鹰是长时间高空飞行的无人机,可提供较大地理区域范围内的高分辨率、近实时图像,以支持军事任务、人道主义和环境监视等任务,该机型还可在恶劣环境下进行通信和信息共享能力,^①从而实现全天候作战。为支持空自的远程作战能力,2017年12月,美军授权波音公司为日本生产 KC-46A 加油机,日本也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国际客户,该机型也是列装美国空军的新型加油机,这必将极大扩大日本航空力量的作战半径,提升其远程应对能力和威慑力,也将为航空自卫队的海外部署和作战提供支持。日本海空自卫队现有的武器装备,如战斗机、运输机和预警机,准直升机航母、大型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等硬件,早已实现大型化和远程化,已经成为一支战略性武装力量。

在太空、网络等新的战略空间,日本同样通过借助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构建和提升在新战略域的相应能力。美国是太空领域的技术大国,也是该领域的军事大国。近年来,各国强化了对太空的开发及利用,日本也加强了对太空的探索力度。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将太空列为关键战略军事领域,指出“太空不仅是收集数据和信息的平台,还要将太空、网络和电磁波等新领域的能力融入陆海空的传统空间防卫力量之中,力图借助乘数效应来增强整体能力”,提出“要在太空领域,拥有干扰敌方指挥控制、信息通信的能力。”^②2018年,日本先后发布新版《宇宙基本计划》《2018—2025年中长期发展目标》和《中长期发展计划》等多份文件,旨在突破和平利用太空的限制,构建新的航天发展战略。2020年6月,日本修订《宇宙基本计划》,指出“如果缺少对太空的利用,现代的安全保障将无从谈起”。^③为此,日本计划在未来形成包括2颗数据中继卫星在内的10星组网系统,为自卫队构建专属军事通信卫星“煌”系列,目前已完成2颗卫星组网,计划2022年发射第3颗。在太空监测领域,受日本和平利用太空政策的影响,日本太空探测技术被限制在对轨道高度在650公里太空漂浮物的观测精度为1.6米的级别,如果想抢占太空探测前沿,日本需提升

① 《日本购买诺格公司全球鹰和 E-2D 先进鹰眼以执行 ISR 任务》, <http://www.dsti.net/Information/News/92586>, 2021-01-19。

② 青木節子「自国の防衛に宇宙の活用を決意」, <https://www.nippon.com/ja/japan-topics/c06508/>, 2021-01-19。

③ 「宇宙基本計画の変更について」, https://www8.cao.go.jp/space/plan/kaitei_fy02/fy02.pdf, 2021-01-19。

雷达识别精度。为此,日本积极利用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获得美国支持和援助,以建成太空感知系统,将对太空漂浮物的识别精度提升至10厘米。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成员不仅被派往美国科罗拉多空军基地接受培训,还派遣联络官常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的美军太空作战中心。同时,日本还多次参加美国主导的“施里弗”“全球哨兵”等太空战系列演习。^①在经过学习、筹备、酝酿后,2020年5月,日本成立“宇宙作战队”,该支特殊的部队将继续接受美国太空军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帮助,培养精通宇宙领域的自卫队官员,提升太空监测能力。在网络领域,日本将网络空间归为安保政策的重要领域。2015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明确将网络空间纳入日美合作范畴,提出将加强情报共享、网络安全、联合演练等方面的合作。特朗普担任总统后,日美在2017年第五次网络安全对话中再次确认了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展示了加强合作的决心,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两个网络大国合作应对威胁及网络攻击的姿态;同时日本还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以确立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规则构建中的话语权。

安倍在其长期执政期间,通过利用、调动日美同盟这一重要战略工具,为日本在推行国家战略诸项政策落地提供了极大辅助性作用,尤其在外交与安保领域取得了诸多实际收效。同时,日本又以双边协议、声明等方式将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承诺书面化、法律化,构建起长效机制,使其超越党派纷争而上升为国家意志,确保美国的承诺不会因政府的改变而动摇。但另一方面,美国作为拥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更是日美同盟的主导国,在更大程度、更多议题和更广范围内决定着同盟的发展方向与战略定位,日本对同盟的利用只有在与美国主导的同盟利益保持协调时,才能够取得最佳收效,尤其是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的特朗普政府,“淡化了美国对世界、对盟友的‘责任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为我、盟友为我’的权利意识。特朗普政府更希冀依赖‘免费搭车’的方式,获取非对称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安全利益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为我’的新利益传输机制”。^②即便更为重视同盟及伙伴关系的拜登政府,也同样以美国国内利益为优先考虑事项,其对盟友的重视更多是出于“战术利用”的政策考量,终极目标是调动盟友力量共同维护美国主导下的利

① 丰松江:《日本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中国国防报》2020年5月6日,第4版。

② 陈友骏:《特朗普政府对日政策的评析与前瞻》,《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第54页。

益分配规则与秩序。因此,日本“用美”政策的收效很难完全达成其预期收益。

(二) 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负面效应

第一,在朝鲜问题上,日本一度陷入外交尴尬和“悬停”状态。虽然美国针对朝鲜一再进行核导及其发射实验表示,将向朝鲜展示“世界从未见识过的火与怒”,^①并称“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美国将“百分之百”地支持日本;在绑架事件上,特朗普在访日时会晤日本被绑架人质家属,并表示同情,还答应安倍将在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时传达日本在绑架问题上的态度及政策。但在实际解决问题过程中,特朗普及其领导下的美国在朝鲜核导及绑架问题上并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在表示“火与怒”之后,很快经韩国与朝鲜进行接触,与金正恩举行最高领导人会晤,特朗普还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踏过三八线进入朝鲜领土的美国在任总统,与朝鲜达成了“一个交易”。^②朝鲜暂停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朝美关系显著改善。针对日本关注的朝鲜中短程导弹发射问题,特朗普称:“很多人都在测试那些导弹,而不仅仅是他(金正恩)。我们生活在一个导弹世界,无论你喜欢与否。”^③对日本而言,特朗普在未与作为密切盟国的日本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与朝鲜达成“交易”,无疑是日美关系史上又一次“越顶外交”,给日本造成冲击,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对美国安全保障承诺的信任和信心。此外,在安倍刻意打造和维系的“安一特”关系中,特朗普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特朗普,而是因为他是美国总统”,^④这也是对安倍推崇的首脑外交的讽刺。“特金会”后,朝鲜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与朝核六方会谈中除日本外所有其他四国首脑的直接会谈,日本也积极寻求与金正恩之间的高峰会晤,但未得到朝鲜任何回应,这也体现了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单向依赖美国带来的负面效应。拜登在朝核问题

① “Trump: North Korea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if More Threats Emerge,” <https://www.foxnews.com/world/trump-north-korea-will-be-met-with-fire-and-fury-like-the-world-has-never-seen-if-more-threats-emerge>, 2021-02-26.

② “Donald Trump Responds as North Korea Fires Short-range Missile Test,”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9/05/04/north-korea-fires-short-range-missile-east-sea/>, 2021-03-27.

③ Hans Von Der Burchard, Gabby Orr, “Japan Feels the Pain of an Ally like Trump,”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japan-donald-trump-uneasy-alliance/>, 2021-03-27.

④ Anthony Kuhn, “In Trump’s Japan Visit, Golf, Sumo Wrestling—And A Raft of Policy Differences,” <https://www.npr.org/2019/05/27/727280758/in-trumps-japan-visit-golf-sumo-wrestling-and-a-raft-of-policy-differences>, 2021-04-02.

上的表态仍停留在既有的政策承诺层面,在行动上则以朝核问题为纽带拉紧韩国、日本两个盟国,但在书面及口头政策再确认外,尚未付诸实际行动。

第二,日本积极策应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将给日本及日美同盟的未来走向带来一定程度的“后遗症”。奥巴马政府时期,安倍为修复日本民主党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给同盟造成的损害,极力说服日本国内保守派加入奥巴马极为重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试图以此参与制定“亚洲世纪”的经贸规则,确保日本的地区优势地位,并博取美国好感,以强化同盟关系。经过艰难谈判,在协议几近达成时,特朗普接任总统,他认为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首的世界经贸规则(包括基本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美国参与的其他多边经贸协定)有损美国利益,美国将重新谈判相关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成为特朗普就任后首批退出的经贸协定之一,日本试图借助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掌控亚太经贸规则的愿望落空,“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在战略上的一次重大失误”。^①“安—特”关系引领下的日美同盟也未能给日本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谈判中带来任何特殊收益,日本未能逃脱特朗普“关税大棒”的打压。安倍也表示对此“无法接受”,“从安全角度看,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对美国的军事盟国日本加征关税”。^②短期内,拜登政府仍将以内政为最优先事项,为恢复经济,拜登认可并继承“购买美国货”倡议,因此,日美贸易问题不会因拜登重视日本而发生根本性逆转。

此外,特朗普怀疑日美同盟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一再要求日本增加驻日美军费用分担额度,迫使日本加大防务费用支出,甚至要求日本构建完全独立的防卫能力,以减少美国的安全成本支出,并将经贸问题与安全挂钩,以撤出驻日美军或终止日美安保协议相威胁,迫使日本做出更多让步。特朗普的言行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动摇日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赖,冲击日美同盟的心理基础;对外造成“日美同盟是可以被‘交易’的”印象,打破日美宣称的“牢固而紧密的同盟”的神话;使国际社会对日本引以为傲的“安—特”关系产生怀疑;更严峻的是:日美界定的“同盟威胁者”将意识到同盟的脆弱性,将可能对同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会因美国总统的更替(很难预测四年后的美国总统是否再次完全改旗易帜)而彻底消弭。

① 归泳涛:《TPP的政治学:美日协作的动因与困境》,《日本学刊》2017年第1期,第47页。

② “Japan's Abe Hits Back at Trump's Plan to Slap Tariffs on Ally,” *News Max*, March 28, 2019, <https://www.newsmax.com/t/newsmax/article/863122?section=politics>, 2021-03-30.

第三,在地区层面,日本绑定美国的战略选择,使其在安全上进一步疏离亚洲邻国,将日本置于亚洲邻国的安全对立面,无助于其“大国地位”的战略追求。日本与周边邻国因历史、领土等问题而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这使日本在地区范围内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是不被信任的国家,菅义伟宣称的“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构建与中俄等邻国间的稳定关系”的政策取向本身即存在难以调和的悖论。拜登政府展示出的对日本的高度重视,甚至可能导致日本严重的战略误判。近期,日本在日美印澳四方峰会、日美“2+2”会谈、“拜菅会”及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中都加大了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强度,甚至插手台海问题,严重恶化了本已呈现向好发展势头中日关系,并公开将日本自身锁定为遏制中国的前沿存在,这种“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煽动集团对抗,这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同本地区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期待背道而驰,只会让世人越来越看清‘美日同盟’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本质和图谋”。^①日本以提升自身防卫力为路径强化日美同盟的政策选择,直接后果必将是引发日本周边国家安全情绪紧张,进而以加强军备或深化军事合作等作为应对手段之一,从而形成安全困境的螺旋式升级,这是值得日本政府及战略界进行深度、全面、长远评估的问题。

此外,日本刻意打造特殊的“安一特”关系,给日本的国际形象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日本主观过滤掉对特朗普政府某些政策的国际公知,特别是对美国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倾向表示理解的做法,引发他国对日本宣扬的所谓“基本价值观”可信度的质疑及国际社会对日本做出独立决策的意志和能力的怀疑,进而加重日本“依附者”的国际印象,这与日本追求的“在后疫情时代发挥国际秩序引领者”的角色定位背道而驰。

总体而言,日本利用日美同盟服务于国家既定战略的相关施策基本取得了前期收益,尤其是日本积极主动利用日美同盟的政策尝试,将带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即从按照美国国家战略走向来框定日本战略规划,调整为将日美同盟作为日本战略规划的工具之一,这将成为日本自主性国家战略规划的起点,开启后安倍时代日美同盟新的磨合期及合作领域,这期间将激活诸多不稳定性因子。日本前驻美大使称,“以既有概念来理解日美同盟及国际社会的课

^①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涉华消极内容答记者问》,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dhdw_673027/t1869624.shtml, 2021-04-30。

题的时代已经结束。日本拥有足以引领世界思维的构想力、外交力、宣传力和说服力。同美国新政府也应堂堂正正地打交道”。^①可以预知,日美同盟仍将继续保持动态调整态势,并将随后疫情时代世界新情势的发展而在纵向战略空间和横向联系层面,继续拓展和深化合作范畴和领域,日本也将继续借助同盟之力探索重构自身在国际社会相应位置的更为有效的政策路径。

结 语

日美同盟在战后日本国家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辅助性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将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冷战战略的前沿基地和重要盟友,这变更了日本的战败国身份,为进一步提升日本的政治地位提供了可能。日本则以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方式换取了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及广阔的市场。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并成长为经济大国,这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位提供了实力支撑。至安倍执政时期,日本以摆脱“战后体制”束缚、重构政治大国地位为国家战略目标的政策框架已经发展成熟,并付诸政策实践。

长期结盟美国的政策实践及政治经济获益使日本形成了对美国及日美同盟的心理及事实依赖,日美同盟也被塑造成为日本外交与安保政策的基轴。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相关政策的推出及实践仍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而展开,不同的是在安倍政府的政策设计中,日美同盟被视为重要战略工具,服务于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束缚、重塑大国地位的总体战略目标,也即安倍政府将政策框架的核心调整为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而非日美同盟共同的战略利益,当日美同盟的共同利益与日本国家利益之间产生偏差时,日本将修正同盟政策,使其从属于日本国家利益,而非相反。同时,日本渐进性采取适宜的政策手段诱导日美同盟调整作用半径、领域等,进一步将其打造为日本追求全方位大国目标的战略工具,成为日本在全球治理领域获取和扩大制度性权力的有效途径,并使日本成为同盟关系中的“对话者”而非简单的“听话者”。

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相关施策取得一定收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诸

^① 《日驻美大使杉山晋辅即将离任 期待强化日美同盟》,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1/43f4d4b6c738-.html>, 2021-01-21。

多负面效应。对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战略目标而言,日本利用日美同盟政策最突出的获益就是日本煽动并贩售“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威胁”打造成为日美同盟不断强化的外源性动力,从而使美国允许、纵容甚至推动日本不断突破宪法限制,加强安全保障能力,并通过频繁的日美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提升日美军事安全力量间的互操作性和兼容性,使日本自卫队逐渐成长为一支具有强大实战潜力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从而部分达成日本摆脱“战后体制”、追求全方位大国地位的目标。与此同时,日本通过进一步绑定美国亚太战略的方式寻求摆脱“战后体制”,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将适得其反,同时还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政治上进一步分裂在经济领域寻求一体化的地区各国。在后疫情时代,摆脱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日本岸田政府继续积极追随美国,推出所谓“经济安保”的政策噱头,试图以重构价值链的方式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进一步将日本“推离”亚洲,这对日本经济而言也绝非上策。此外,追随美国也使日本的对朝政策走进死胡同。即便如此,“作为盟友,日本是美国的最佳选择,而美国则是日本几乎唯一的选择”。^① 继续深化日美同盟,渐进性扩大日本的自主政策空间,借助同盟提升日本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仍将是后疫情时代的日本政策选择。

^①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Renewing the U. S. -Jap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81011_MorethanEver.pdf, 2021-01-06.